



As to Liang Qichao's Sensitive Understanding about "Nation-State"

HAZAMA Naoki

Abstract: After the coup d'état by Empress Dowager (西太后) on September 21, 1898, Liang Qichao (梁啟超) who was a promoter of Wuxu Reform Movement, took refuge in Japan. He arrived at Tokyo on October 21, 1898. The Japanese treated him very well. Not to mention expenses of livelihood, his political works were eagerly supported by them. Immediately Liang began an activity of saving Guangxu Emperor from Empress Dowager's trick. He wrote demand letters and sent them to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kuma Shigenobu (大隈重信) and other leading figures. There were many supporters as to China's Wuxu Reform Movement in Japanese intellectuals. For example, a bulletin of Toadobunkai (東亞同文會) actively supported activities of Chinese refugees. This society was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 about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 chairman was Konoe Atsumaro (近衛篤磨), President of the House of Peers. Its formation was made up of a variety of peoples. Its bulletin, which was called *Toa Jiron* (東亞時論), made its first appearance in December of 1898. There were many essays of Liang Qichao and Kang Youwei (康有為). It was obvious that *Toa Jiron* supported Chinese reformists in exil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not glad to see their acting in Japan and called upon Japanese government to send them back. Not only Chinese government but also Japanese businessmen in China were not glad to see that Chinese exiles were brisk in their movement. Shiraiwa Ryuhei (白岩龍平) was an entrepreneur of steamship in Shanghai. Because he was an influential member of Toadobunkai, he received the first number of *Toa Jiron* and had his breath taken away. He feared that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run on his business. Then he severely requested to President Konoe that the bulletin should not publish the articles of Liang's party. Considering Japanese national interest, Konoe took follow Shiraiwa's request. Since the 5th number, there was no essay of Liang's party in *Toa Jiron*. In addition to that, Konoe demanded to Liang that he should not engage in publishing work of *Qingyibao* (清議報), the bulletin of Liang's party. I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December 23, 1898. Of course, he was not obedient to Konoe's demand. Having these personal experiences, Liang keenly understood that the basics of political (diplomatic) activity were no more than the interest of nation-state. So he firmly decided to master the science of nation-state. He selected the newest German-made theory of the science of nation-state that was to say Bluntschli's theory. Liang started a section of Zhengzhi Xuetan (政治學譯) in *Qingyibao* and serialize *Guojialun* (國家論). At that time, Johann Kasper Bluntschli (伯倫知理) was the most famous scholar of its discipline. His book *Deutsche Staatslehre für Gebildete* was translated in Japanese, and Aduma Heiji (吾妻兵治) tried again to translate it in classical Chinese, on the theme of *Kokkagaku* (國家學). Liang made use of Aduma's translation and he basically succeeded in his attempt.

Keywords: Liang Qichao; Konoe Atsumaro; *Toa Jiron*; Shiraiwa Ryuhei; Aduma Heiji;

Author: HAZAMA Naoki Graduated from History, School of Liberal Arts, Kyoto University in 1961. He quitted school after he finished his PhD courses at School of Liberal Arts, Kyoto University in 1966. He became assistant professor and professor at School of Liberal Arts, Kyoto University respectively in 1977 and 1985. He earned his PhD in Literature at School of Liberal Arts, Kyoto University in 2001. Now he is an emeritus professor of Kyoto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Kyoto Industrial University and vice President of Sun Yat-sun Memorial Association.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His main works include *The dawn of Chinese socialism; A Joint Study of Liang Qichao: The Reception of Modern Western Thought and Meiji Japan*; Co-authored works include *Collection of Revolutionary Theory, Selec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Looking at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with Data; Towards a Self-Reliant Asia*.

梁啓超對“國家”認知的上路歷程

狹間直樹



[摘要]戊戌政變後，梁啓超逃亡日本。先是在日本駐華公使館避難，後乘坐日本軍艦來到東京。在日本四個月的流亡生活，使梁啓超對“國家”之於自己如何相關有了具體的認知。起初，日本全面支持梁的生活，使其開展營救光緒皇帝的請願活動。雖然他致信日本外相大隈重信等人沒有得到善意的回應，但在日本國內還是有一股支持康梁維新派逃亡人士的勢力，其中開展最明顯支援活動的就是東亞同文會的機關雜誌《東亞時論》。該雜誌刊登梁啓超等人的文章，支持他們的宣傳活動。

然而不久之後，事情發生了轉折。在清國經營實業的東亞同文會會員白岩龍平因擔心影響自己事業的發展，致信會長近衛篤磨，請求停止對康、梁的支持（具體指在《東亞時論》上刊登文章）。近衛篤磨從外交以及經濟方面的國家利益出發，同意白岩龍平的意見，採取措施不再在《東亞時論》上刊登康、梁等人的文章，而且還要求梁啓超斷絕與《清議報》的關係；同時，康有為也被放逐加拿大溫哥華。正是日本政府出於保護日本國民在清國的活動以及避免在外交關係中的不利因素這兩點，使梁啓超這個直接的當事人過去祇是用“腦袋”理解的問題，如今卻有了切膚之痛。他深刻認識到，民需要保護民之“國家”；如果沒有，則須創造，為此必須學習有關“國家”的知識和理論。於是，為了讓更多的人瞭解並普及關於“國家”的學理，梁啓超在《清議報》上開設“政治學譯”專欄，連載的即是德國學者伯倫知理的《國家論》（吾妻兵治譯為《國家學》）。此後，梁啓超將自己思想之根基落於“國家主義”，並將之作為自己的根本思想；直到約二十年後，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方纔宣佈放棄。

[關鍵詞]梁啓超 近衛篤磨 《東亞時論》 白岩龍平

[作者簡介]狹間直樹（はざまなおき），1961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966年在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取得滿期後退學，1977年擔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教授，1985年擔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2001年獲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京都大學名譽教授，京都產業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兼任孫中山紀念會副理事長；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代表性日文著作有《中國社會主義の黎明》、《梁啓超——東アジア文明史の転換》，合著有《中國文明選 15 革命論集》、《データでみる中國近代史》、《世界の歴史 27 自立へ向かうアジア》，合作翻譯的中文著作有《中國近代史（1840—1924）》（胡繩）、《周恩來傳》（金沖及 主編，全三卷）、《梁啓超年譜長編》（丁文江、趙豐田 編，全五卷）。

前言

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10月，梁啟超（1873—1929）因戊戌政變而亡命日本。在這之前的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11月，廣州起義失敗後的孫文（1866—1925）曾在日本神戶、橫濱落腳，但在日本開始亡命生涯卻是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8月以後。兩人雖然在政治亡命這一點上相同，但在日本的境遇卻宛如天壤之別。

1898年9月21日政變當天，梁啟超曾到訪日本駐華公使館，但祇是與林權助（1860—1939）代理公使見了一面便回去了。晚上，林權助與當時身在公使館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商量之後定下方針，於次日把梁啟超當作亡命者藏匿起來。日方認為，北京未必安全，遂於24日將其轉移到日本駐天津領事館；26日，又將其轉移到停泊在天津港的日本軍艦“大島號”上。這樣一來，梁啟超便完全處於日本政府的保護/管理之下了。

在“大島”艦上，梁啟超獲悉西太后（慈禧太后，1835—1908）在尋找為皇帝治病的名醫，他認為這是繼政變之後要廢黜皇帝的陰謀，便於9月27日致信身在北京的伊藤博文，請求其營救皇帝。^①信的主旨是：沒有了聖明的皇帝，大清與日本將無寧日；廢黜陰謀成功，將變成親俄的西太后專權的局面。這封信的確被送到了伊藤的手上，但沒有取得任何效果。不過，梁啟超的構想力值得關注，他把營救皇帝的運動提到了圍繞清朝的國際形勢這一高度上。

一 梁啟超對日本政界上層人物的活動

1898年10月11日，“大島”艦從天津的塘沽出發；16日，到達日本廣島地區的宮島。梁啟超在那裏下船之後，於21日夜間到達東京。^②政變過後的這一個月時間，為梁啟超認真思考激變境遇提供了絕好的時機。梁啟超與僕人張順以及政變發生兩天後逃到日本公使館的王照（1859—1933）在一起（由於王照日後並沒有與梁走同一條路，所以，除非必要，本文將不再提及此人）。

梁啟超在東京的生活進展順利。之前一年，孫文的在留資格要靠犬養毅（1855—1932）以平山周（1870—1940）的教師名義費盡周折方纔獲得，而梁啟超的情況與之不同，祇要有政府方面的認可就可以了。12月10日（農曆十月廿七日），梁啟超在給夫人的書信中寫道，這段時間的生活費仰仗“日本國家”的供給；不久以後，還會有雜誌（《清議報》）發行的收入。^③

在到達東京站的夜裏，一行人住在站前的三橋旅館。第二天（22日），搬到牛入區（今新宿區）市谷加賀町柏原文太郎（1869—1936）家中。^④但是，因為地方太小，隨後又搬到同一區早稻田鶴卷町40番地高橋琢也名下的房中。當天，與梁會面的有徐勤、林北泉、羅孝高、鄭晟禮、畢永年。徐勤是康有為派出的橫濱大同學校的負責人；林北泉是橫濱有實力的華僑；羅孝高是康有為的弟子，在日本留學；鄭晟禮的情況目前還不清楚；畢永年是政變發生後來到日本的同志。大家都是維新派同人。

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安全對策。梁啟超與王照以生病為由並不外出，據說除中西正樹、大內暢三、犬養毅、高田早苗、鳩山和夫、高橋橋三郎、吉田俊男、西鄉吉義、小林某、平山某以外，拒絕與其他人會面。中西正樹是貴族院議長近衛篤磨（1863—1904）的部下，也是負責梁啟超等人來東京及安排住宿的人。大內暢三是東京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在近衛手下與白岩龍平（1870—1942）等人為了同文會的成立鞠躬盡瘁。雖然犬養毅不需再多做介紹，但值得說明的

① 《伊藤博文關係文書》（東京：塙書房，1980），第8冊，第413頁。

② “警視總監西山志澄より大隈外務大臣宛”（明治31年10月24日），外務省記錄：《各国内政關係雜纂・支那ノ部・革命党關係（亡命者ヲ含ム）》，第1卷。

③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69頁。

④ 《近衛篤磨日記》（東京都：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68），第2卷。他在1898年（明治31年）10月16日寫道：“中西正樹、柏原文太郎已經為康梁安排好寓所。”（第169頁）說的應該就是這件事。下文中關於近衛的日記僅寫明年月日。

是，他因為幫助孫文取得了在留資格，所以在大陸浪人中是一個掌舵者的形象。高田畢業於東京大學，立憲改進黨成立以來在大隈重信（1838—1922）的手下表現活躍，當時任文部省參事官等。鳩山雖然也畢業於東京大學，但他同時也是東京專門學校的校長，在政治上屬於立憲改進黨，在大隈內閣中還擔任外務次官。

平山某即平山周。高橋、吉田、西鄉、小林這幾個人情況不詳，但在政治上都屬立憲改進黨一派，可以推測在對華關係上較接近同文會。另外，提供自家住房的柏原文太郎畢業於東京專門學校，與近衛篤磨和犬養毅關係緊密，是梁啟超身邊最支持他的日本人。總之，上述這些人，大部分都成為1898年11月2日創立的東亞同文會的成員，各自活躍。

日方對安全的注意是因為害怕西太后的刺客。四年多以前（1894年3月28日），在上海發生的金玉均（亡命日本的朝鮮人，1851—1894）暗殺事件讓相關人士得到了重要的教訓。一般來說，在日本外國人的安全由警察負責。雖然日本的警察也有相應的覺悟和準備，但這些情報來自警察密探的調查報告，所以中西正樹等人的防衛方法與警察的方法又有所不同。也就是說，梁啟超等人得到了雙重保護。而且，被允許會面的人士都是警察眼中距離危險人物較遠的人。警察在保衛國家中的面目栩栩如生，應該說即便是政府相關人士，對於非藩閥的“民黨”方面，日本的警察也一直在搜集情報。

在東京安頓下來的梁啟超最早開始的依然是營救皇帝運動。作為一個在政變中倖免而亡命成功的維新派人士來說，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抵達東京五天以後（10月26日），梁啟超在給大隈重信外相（首相兼任）的信中如是開頭：

啟國此次政變，其原因有四端：一曰帝與后之爭，二曰新與舊之爭，三曰滿與漢之爭，四曰英與露（俄）之爭。然要而論之，實則祇有兩派而已。蓋我皇上之主義在開新，用漢人聯日英以圖自立；西后之主義在守舊，用滿人聯露西以求保護。故綜此四端，實為帝、后兩派而已。^①

與此前寫給伊藤的信相比，從分析視角上來看，該信指出此次政變從思想上是“新”與“舊”、政治上是“滿”與“漢”、國際上是“英”與“俄”的對立鬥爭，最後以宮廷內“帝”與“后”權力鬥爭的形式爆發出來，在多角度進行政治形勢分析方面，較之以往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接下來闡述戊戌維新的概略。6月11日，光緒帝（名載湉，1871—1908）召集群臣宣佈改革；16日（文書中誤記為15日）召見康有為（1858—1927）。康呈上《日本變政記》，皇帝更加推崇改革。但是，英明的皇上也受到了西太后的掣肘，其所期待的改革連十分之一都沒能實現。模仿明治維新的“議定、參與”而欲設的制度局、“地方自治制度”等，也沒能說動那些官員；因為他們深知，國權掌握在西太后手中而非皇帝手中。為打破這一局面，皇帝為尋求忠誠，把北洋三將之一的袁世凱（1859—1916）提拔為“侍郎”，密詔其“保護康有為、譚嗣同”。然而消息洩露，西太后垂簾聽政，皇帝被幽禁。

他接着說，中國的戊戌維新與日本明治維新的前夜情況類似：“敝邦今日情形，實與貴邦安政慶應之時（1854—1868）大略相類，皇上即貴邦之孝明天皇（1846—1868年在位）也，西后即貴邦之大將軍也。”整個滿族即日本的幕僚，中國也存在“公武合體論者”和“尊王討幕論者”。但皇上在給康有為的密詔中明確寫道：“不變法，則祖宗之國不保；若變法，則朕之位不保”，可見“公武合體說”是絕不可能實行的。這與日本也無法實行是同樣的道理。

關於“尊王討幕說”，梁啟超先列舉西太后的罪行，再闡釋其不可能性。西太后的罪行，從毒殺東太后，到賣官鬻爵、驕奢淫逸等數不盡數，與漢朝的呂后、唐朝的武則天一樣必須討伐。但是，又與明治維新有三點不同：（1）皇室與幕府是“君臣之分”，而西太后與皇帝卻是“母子

① “梁啟超書ヲ大隈伯ニ致シテ清皇ノ為メ救援ヲ乞フノ件”，《日本外交文書》（東京：日本外務省，1953），第31卷，第1冊，第696頁。

之名”。(2)天皇在京都，將軍在江戶，不同處一地；而皇帝與西太后在同一宮殿，皇帝無法自由活動。(3)“薩長土佐諸藩”擁有兵權，而“敝邦之長門”“湖南”卻在“政變數日……一切權柄悉歸守舊之徒，無不可用矣”。

乍看之下，這個對戊戌維新與明治維新的類比太過單純且流於表面，但對於欲模仿日本進行“維新”的梁啟超而言，這是他剛到東京時自己考慮的對歷史的概括。他這樣考慮，是因為要向日本請求營救皇帝。所以，在作上述討論之後這樣總結：“支那之安危”關乎“全地球和平爭亂之局”。為日本計，日本之安危與“支那”的安危息息相關，而“支那”的安危則取決於“皇上位權之安危”。如若英明的皇上得以復權，變法得以施行，則風氣大開，講“專門之學”之人輩出，年輕的活力幾乎不遜於三十年前之貴國。祇不過，國際形勢在這三十年間大變，敝國處於如狼似虎之列強包圍之下，希望能夠獲得“同洲、同文、同種之大日本”之援助，克服當前的困境。

這封信寫就幾天之後，梁啟超把表達決定亡命之意的長詩《去國行》發表在11月1日出版的日文報紙《日本》上。以下開頭的這四句即表達了其決心：

君恩友愁兩未報，
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
割慈忍淚出國門，
掉頭不顧吾其東。

在結束的部分還有“不幸則為僧月照，幸則為南洲翁”，指的是其具體的作用。“南洲”是維新元勳之首西鄉隆盛（1828—1877），“月照”（1813—1858）原是清水寺住持，後成為獻身於尊王攘夷運動的西鄉的同志。1858年12月，為免於受到迎合幕府意志的薩摩藩侯的追究，西鄉與月照在鹿兒島灣投水，月照死了，西鄉生還。此後大家都認為，月照的死激發了維新之成功，使活下來的西鄉獲得了維新的成功。作為生者與死者分工的中國版，毋庸置疑，月照指的是譚嗣同（1865—1898）等六君子；但在此後不久梁啟超撰寫的《譚嗣同傳》中，“程嬰杵臼，月照西鄉”的分工卻成為譚向梁說的話了。

然而，梁啟超苦心完成的致大隈外相的信沒有取得任何成效。主要原因是，大隈內閣的基礎正在動搖。1898年6月30日成立的大隈內閣，被稱作日本第一個“政黨內閣”，是以板垣退助（1837—1919）領導的舊自由黨派與大隈領導的舊進步黨派（繼承了立憲改進黨）合併組成的憲政黨為母體（故又稱為隈板內閣），但因受到所謂“共和演說”事件的影響，政局變得混亂。在一次會上，尾崎行雄（1858—1954）文相說了句“即便夢見有共和政治”，被人抓作把柄攻擊為“不敬”，被迫於10月24日引咎辭職。大隈推舉自派的犬養毅於27日繼任後，激化了與舊自由黨派之間的黨內對立。11月8日，被迫總辭職。接下來上臺的是山縣有朋（1838—1922）內閣（第二次）。當然，就算在平時，大隈也不會從正面回應梁啟超的請求，這一時期就更不會有什麼反響了。

這時康有為也來到了東京。康有為在政變前日便離開北京，乘坐英國船隻前往上海。政變後，他逃出西太后的追捕，躲入英國的保護之下。在香港接觸過的宮崎滔天（1871—1922）幫其確定了亡命日本的道路，於10月26日來到東京，照料其在東京生活的依然是柏原文太郎。對於柏原的熱情周到，康有為曾直接向近衛表達謝意：“君之懇切款待備至，令毫無身在異國之感，不勝感激。”

抵日後，康有為着手進行的營救皇帝運動是撰寫、宣傳“奉詔求救文”。即奉皇帝密詔尋求援助的小冊子，因其收錄了不少偽造史料而聞名。這一運動，對康梁派的活動而言意義重大，但由於這並非由康主導且公開進行的，故不在本文中提及。

由於梁啟超身邊的黨派為大隈派人士，故對於這一混亂的政局，梁啟超一定聽到過非常透徹

的解釋。日本的支持者也必定奉勸其要同時向其他的上層政治家活動，所以對於不同的人，梁啟超在修辭上修改了開頭與結尾，發給許多人；而信的正文，也就是要求營救皇帝的部分，均與給大隈的信相同。

收信人一方留下記錄的有近衛篤麿。梁啟超在信末寫的日期是10月30日，所以給大隈的信應該是四天之後。近衛在11月2日的日記“來信”一欄寫道：“梁啟超 長篇意見書，與副島伯聯名，轉給伯，留下副本。”11月7日寫道：“把梁啟超意見書借給了谷子爵。”副島種臣（1828—1905）是維新元勳之一，此處與近衛聯名是因為該信是寫給“東邦協會”會長的。谷干城（1837—1911）也是明治政府的元老之一，因反對鹿鳴館式歐化，與之保持距離。此人與曾經批判藩閥政府，在公卿中首屈一指的年輕明星、貴族院議長近衛關係親近，故而托其轉發署名二人聯名的梁啟超書信。

幾天後（11月12日），近衛與康有為會面。當康談到政變造成皇帝改革失敗，提出營救願望時，近衛首先就提到前些天已經通過梁啟超的書信瞭解了政變的大概，並說道：

今春以來，余接到貴國皇帝大招才後，實行各項改革之消息，心下亦喜亦憂。為何喜？

當然是為貴國邁向開明進步而喜。為何憂？乃惟恐改革失於激進，化為泡影。

這是甲午戰後主張“亞洲門羅主義”之日清同盟的近衛的見解。他認為失敗是因為做法不對，意思是日本難以去做擦屁股的事情。所以，近衛一再表明日本的維新也經歷了多年的曲折，清國的維新“希望未來也以前車為鑒，採取漸進的方針”。對於康有為提出恢復帝位的請求，近衛祇表示，這既是兩國之間的問題，也是列強之間的問題，沒有給予正面回答。

副島種臣與谷干城的意見尚不清楚。但是，處在政權中樞的人要在支持變法維新的同時應付政變後的局面，近衛的理論無疑是極為有用的。其實，在給品川彌二郎（1843—1900）的書信（《民報》第24號）中，梁啟超寫道：“近聞貴邦《新報》中議論，頗有僕等為急激誤大事者。”當時，日本對戊戌變法/政變的評論，主流基本如此。還有一則軼事說，明治維新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勝海舟（1823—1899）曾對康、梁說，戊戌維新祇不過是“急激的改革”，“不合國體”；康有為聽到後，憤而離席。^①政界上層的意見大概基本都是如此。

梁啟超於10月30日寫給副島、近衛的信，原本是寫給“東邦協會會長副島伯爵/近衛公爵暨諸君子閣下”的。東邦協會成立於1891年，是以研究東邦，即清國、韓國等地區問題為目的的組織。剛創立時，會員約為百人；甲午戰爭時，會員人數減少；戰後，隨着清國改革風潮，會員人數有所增加，1898年會員人數達1200多名。這反映了當時日本人對清國感情的積極一面。此時的會長為副島，副會長為近衛。梁啟超的這封信以無署名之“支那志士之憤悱”為題刊登在《東邦協會會報》第53號（1898年12月）上。^②

就在這時，日本的“亞洲主義”團體也迎來重組時期。重要的是，1898年4月形成的東亞會與6月組成的同文會於11月2日合併組成“東亞同文會”，由近衛篤麿擔任會長。另一個擁有較長歷史的組織“亞細亞協會”晚些時候即1900年也合併到東亞同文會中，但直到1914年，東邦協會一直保持着組織上的獨立。

東亞同文會的機關雜誌《東亞時論》創刊號於12月13日印製發行，上面刊登了致東邦協會之《上副島近衛兩公書》。值得玩味的是，這封信被《日本人》第80號（1898年12月5日）以梁啟超“論中國政變（寄東亞會）”為題刊登出來。《日本人》是三宅雪嶺、杉浦重剛、志賀重昂創建的政教社的機關雜誌。政教社反對歐化，主張國粹主義；其國粹與日後排他性的國粹主義不同，不對其他國家和民族採取蔑視的態度。因為東亞會沒有機關雜誌，所以讓《日本人》代為發

① “中西重太郎君”，《支回願錄》（東京：原書房，1968），東亞同文會 編，下卷，第633頁。雖然沒有出處，但中西重太郎是康有為離日時的隨行人員，故應該可信。

② 這篇文章以“新黨某君上日本政府/會社論中國政變書（錄日本東邦協會報）”為題刊登在《知新報》第79號（1899年3月2日）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2卷中重新收錄這篇文章時寫為“逸名”文章，並附有按語“疑是梁啟超之作”。

表。這反映了東亞會與政教社之間的親近關係。實際上，三宅等人都是東亞會的會員。

二 日本的知識分子對康、梁活動的反應

梁啟超向日本政界上層發出的營救請求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他自己直接認識到這一事實是在11月27日與近衛篤磨會見時。當天，梁啟超在柏原文太郎、中西正樹的帶領下，與羅普（1876—1949）等人一起到訪近衛邸。梁啟超向其請求幫助皇帝復位，近衛肯定此為“所期之事”，同時也闡述了實行這一行動的決心與準備。他列舉了很多例子，稱英俄兩國侵略波斯、阿富汗、朝鮮等東邦諸國的方法乃是利用宮廷裏的各種勢力。此次政變是否也是如此？若如此，則需要慎重、靈活，見機行事。

由於翻譯是羅普，所以近衛的意思應該表達得很清楚，但梁啟超的回答如何目前還不清楚。雖然他肯定從半月前會過面的康有為那裏已知悉了近衛的意見，但“維新”之志相同的近衛所表現出的慎重態度，在發現“國家”意志方面，還是給梁啟超帶來了相當大的啓發。

如此，則祇有廣泛訴諸輿論這一條道路了。最先撰文表示對康有為、梁啟超支持的是年輕的評論家內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他的文章《如何對待康有為等人》刊登在《日本人》第80號上，應該是該雜誌編輯有意為之，以表達日方的見解回應梁啟超的文章。內藤在文中批評了那些在戊戌維新進行過程中高呼有識者應該對其支持和稱讚，而隨着政變遭受挫折又“咎其妄舉”、“議其躁急”、“嘲其不去殉難”的世態人情，指出政府正欲讓康梁離開日本，呼籲“在野志士”為他們“達成志業”提供方便。所謂視康梁為麻煩的政府，指的是計劃令其出走英、美的大隈憲政党内閣及其後任“毫無高尚之方針”的山縣有朋內閣。

12月10日、11日，內藤湖南又在《萬朝報》上發表了《讀梁啟超政變論》。《萬朝報》是當時以發行量大為榮的進步大報，由此可以窺見其見解在當時輿論界的地位。內藤明確指出，梁啟超的議論“極允當，深通我之故事，最切其現狀”，認為清國要自立必須進行改革，改革的成敗在於皇帝的安危這一見解與我輩所見吻合；呼籲支持梁啟超，還把《政變論》之綱要介紹給世人。他在結語中稱：“以此而不能撼我國論，非彼之誠不至，乃天之東亞無祖，我國論若不為此而動，不僅為我國民之恥，乃天不眷我邦也。”最後還補充道，近來士論失堂堂之風氣，“人之獨立任事之時，不請卻去助，來求援則束手言他，不與之謀”；以前每每見之於國內之事，時至今日又欲施於外客；“悲吾輩之君子國之人竟如此輕薄，令外客恥笑”。另外，文章中還有“對清交涉，若非強硬主義恐不奏效。此從其親切語之我輩而知”。由此可知，此時內藤已與梁啟超見過面。

梁啟超進行的另一個宣傳活動是向東亞同文會機關雜誌《東亞時論》投稿。

東亞同文會乃是東亞會與同文會合併後於1898年11月2日在東京成立的組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是日本“亞洲主義”團體的中樞。該會通過的“發會決議”（《東亞時論》第1號）有四條內容：“（1）保全支那；（2）幫助改善支那；（3）研究支那時事，以期實行；（4）喚起國論。”會長是近衛篤磨，幹事是陸實、池邊吉太郎、佐藤宏、井上雅二、田鍋安之助（其中，田鍋是常任幹事）。近衛、佐藤、田鍋出自同文會，陸、池邊、井上出自東亞會，會費為每月一日元。在1897年，新任巡邏警的月薪為九日元，新任小學教師的月薪為八日元。照此而言，會費是很高的。不過，若是“官員”，新任者的月薪為五十日元，與現在相比，當時不同身份的人差別很大，會員基本上都是“官員”以上階層的人。

在11月10日召開的第一次幹事會上，財部熊次郎（1872—1924）被選為機關雜誌《東亞時論》的主編。財部是近衛手下的能人。從留下來的文章《支那保全與北京政府》（《東亞時論》第2號）來看，他雖然自知將會變成“干涉政策”，但依然提議清政府改革自存。這是一篇遵守“發會決議”第一條與第二條的文章，因其是宮崎滔天的友人，由此推測他應該是一位熱心於

清國改革的人。

版權頁“發行兼編者”一欄還寫着志村作太郎的名字。第7號《會報》上曾寫着“久為本會雜誌部鞠躬盡瘁之會員志村作太郎將遠渡朝鮮而退社，松岡又五郎替代之為編輯一職”，故財部之下，應該是志村作太郎在從事實際的編輯業務。《東亞時論》第6號上出現的志村南缺應該是志村作太郎，但那篇《對韓意見》卻是一篇侵略論調的文章，認為應該“扶植”對韓“勢力”，由日本“保護”韓國。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對朝鮮的歧視並非與對華的蔑視有直接的關係。

另外，第4號《會報》的“入會者”一欄出現了內藤虎次郎的名字，第5號《會報》寫着從2月1日起“東亞時論編輯監督囑託會員內藤虎次郎擔任”，但對於內藤與財部的關係及分工仍不清楚。

《東亞時論》（半月刊）的創刊號與第2號缺版權頁，後來的刊行日期為10日、25日。近衛曾在日記中寫到，創刊號稍微遲了一些，在12月13日纔印完。由此可以推測，創刊號原本預定12月10日發行，但稍微遲了一些；第2號應該是12月25日發行的。對發行日期的在意是因為，這與1898年12月23日梁啟超創辦《清議報》（旬刊）相關。

三 《東亞時論》與《清議報》

梁啟超最初開展的是一般的宣傳工作，先向有關係的雜誌投稿，對象是《東亞時論》。作為東亞同文會的機關雜誌，《東亞時論》匯聚了一批對東亞經綸持一家之言的人，所以很可能是以投稿形式的約稿。

《東亞時論》創刊號，正文共六十一頁，再加上一些廣告，卷首設有“會報”欄，刊登的是東亞同文會的“主意書”、“發會決議”、“規則”、“董事”、“會員”、“報告”。會員一共六十名，有“住所、姓名”一覽表。“報告”比較詳細地記錄了同文會成立的經過。經過數月的準備以後，時機成熟，1898年10月27日，東亞會的平岡浩太郎、犬養毅、三宅雄二郎（雪嶺）、池邊吉太郎等人與同文會的宗方小太郎、中野二郎、中西正樹、大內暢三、田鍋安之助就合併一事進行協商，定會名為“東亞同文會”，選三宅、池邊、中西、田鍋等人為主意書、規約的起草委員，擬定草案，11月2日召開成立大會。

《東亞時論》創刊號還設了“論說”、“雜錄”、“通信”、“投稿”、“時事”、“外電日錄”各欄。（1）在“論說”欄中，刊登的是近衛篤磨的《帝國的位置與現代的政治家》等五篇文章，認為作為政府的外交方針應該把支那保全論定為“國家大計”。雖然在對應態度的強硬程度方面各自主張不同，但論述的都是日本在對華政策中的利益問題。（2）在“雜錄”欄的八篇文章中，有一篇是梁啟超的《上副島近衛兩公書》。原來的文章與前述《東邦協會會報》上刊登的為同一信函，但是《東邦協會會報》上的信把“梁啟超”、“啟超”、“康”、“康有為”、“逆后”等約十處固有名詞作了空白處理，而《東亞時論》上的信則把臭罵西太后的“以西后之罪……又有難焉者”約九十字處理為空白。兩者都對北京的西太后政權有所顧慮，但通過對梁啟超書信的刊登也表達了支持之意。（3）在“投稿”一欄，刊登了更生（康有為）的《唇齒憂》^①和任公（梁啟超）的《論支那政變後之關係》（目錄上寫的是《政變後論》）兩篇。康的《唇齒憂》雖然是一篇傾心之作，但主題極為單純。內容是說，西太后政權在崩潰之前一定會把中國交給俄國，這將會帶來與中國有“唇齒”關係的日本的滅亡。為保住日本，首先要拯救“支那”，為此則必須迅速營救“聖明英武”的皇帝進行復辟。故請求日本的幫助。其中還有日本與“支那”為“同種族、同文字、同風俗、同政教，所謂諸夏之國、兄弟之邦”的表述。梁啟超的《論支那政變後之關係》，是把戊戌政變置於當時的國際關係中進行考察，批評日英沒有對俄國進行抗議。第1章的標題為“支那與各國之關係”，第2章為“關係之問題”，第3章為“日英

① 《唇齒憂》一文沒有收錄在姜義華、張榮華編校的《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全十二冊書中。

政策旁觀論”，最後舉例日本違反“公法（國際法）”干涉朝鮮內政，英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幫助土耳其，指出對日本而言，“支那”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朝鮮之於日本、土耳其之於英國。可以說，這是對“雜錄”一欄《上副島近衛兩公書》的補充。康與梁的這兩篇文章都是以“投稿”的形式刊登的。

拿到印出來的創刊號，近衛篤磨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表示非常滿意，儘管此次時間上有些延遲，但“體裁甚好”。雖然祇是說“體裁”，但在製作過程中他經常與負責雜誌的財部、編輯志村見面，由此也可以說包括內容在內，他都是滿意的。總而言之，創刊號甚合會長之意。

然而，批評的火焰從一個意想不到的角度迸發。住在上海的會員白岩龍平看到創刊號後致信近衛，說在機關雜誌上公開刊登梁啟超與康有為的文章，會在清國造成“東亞同文會為康等人之同夥”，《東亞時論》為“表達他們意志之機構”的印象，比較麻煩（12月31日之日記）。該信的日期為12月25日，一週以後就到了近衛手中，速度非常快。

白岩龍平為江南三角洲汽船會社（大東汽船）的業主，其所在的立場必須與西太后政府保持一致，所以列舉了一些日本保護康、梁本身就會對日清關係造成惡劣影響的具體事例。他還稱，東亞同文會為富有“亞細亞思想”之“聰明名士”的近衛為會長的會，所以希望充分考慮其影響力。為顧及日本國內同情康、梁的人士，他也表示非常理解亡命者當前於情不得不做之現實。但他依然強烈表示，“祈望”同文會不要被康、梁所利用。

就在白岩在上海給近衛寫信期間，《東亞時論》第2號已在東京出版。打開這一期封面，即是譚嗣同的照片，誠如白岩所稱，令人懷疑其為“康、梁同夥”。上面是梁啟超親筆題字“支那大俠瀏陽譚君遺像”，下面的譚嗣同半身像覆蓋整面（見圖1）。“俠”，意指扶弱挫強之人，清末更是以一種受人尊敬的形象流行於世。^①照片背面還醒目地印着康有為的悼念詩、唐才常的挽聯和梁啟超的讚頌之詞。

這一期的“雜錄”一欄，還刊登了梁啟超的投稿《第四篇 政變始末》、無署名《清國殉難志士故譚嗣同君傳》、無署名《橫濱〈清議報〉序》（文章名皆依據正文中之小標題）。《清議報》“序”，是12月23日梁啟超在橫濱創辦的《清議報》的“序例”，不包括“宗旨”、“規例”。目錄上印有其筆名“任公”。順便提一句，東亞同文會的“主意書”、“發會決議”也被翻譯刊登在了《清議報》的創刊號上。

《東亞時論》第2號刊登的譚嗣同傳，使用的是《亞東時報》第4號（上海，11月15日）上逸史氏（山根虎之助）《六士傳》中的譚傳。之所以用其作為封面照片的說明，是因為梁啟超撰寫的譚傳在大約兩個月後方纔完成。這篇文章雖然很短，但卻是一篇抓住重點的好文章。

梁啟超的文章《第四篇 政變始末》，過

圖1 《東亞時論》第2號封面



① 章炳麟稱政變犧牲者為“賢”（臺灣旅客：“祭維新六賢文”，《清議報》第7號），是僅次於“聖”之稱謂。

程非常複雜。《東亞時論》雖然未作說明，但同一篇文章曾發表在《清議報》創刊號“支那近事”一欄，是《戊戌政變記》的“第四篇 政變前記”，題目下面寫着：“《政變記》凡八篇，卷帙太繁，今先將第四篇登於報中。”也就是說，這是作為著名的《戊戌政變記》的構思撰寫的文章的一部分（祇不過，《東亞時論》沒有使用小標題《戊戌政變記》）。順帶提一句，《清議報》的“支那近事”一欄持續到第10號，而刊登的內容祇有《戊戌政變記》。此後連載中斷兩個月以後，清議報社出版了對連載文章進行補充修訂以後的單行本（九卷本）。梁的這篇文章包括第1章《政變之總原因》與第2章《政變之分原因》（未完）。《東亞時論》第3號出版時，把題目改成“第四篇 政變前記”刊登了第2章《政變之分原因》（續）與第3章《辯誣》。修改題目之事雖小，卻留下了梁啟超深入思索之後的些微痕迹。

梁啟超此文的第3章《辯誣》，是針對那些批評維新派的日本人所作的聲明，因為他們認為變法意圖雖好但做法太過激進。梁啟超則舉軍事、礦業、貿易、外交、教育作為變法的實例，指出三十年來依靠“溫和”的做法沒有取得任何成效，所以應該肯定光緒皇帝與康有為的方針。例如，關於教育，梁啟超說，迄今為止，開設學堂教授外語雖然培養了翻譯，但卻沒有傳授關於“政治”的學問，沒有修得“學藝（科學技術）”，所以沒能培養出人才。科學不變，出世之道照舊，讀書人家的聰明弟子以入學堂為恥，而無法獲得高才。如此，則祇能說雖有學堂而無教育了（這一節的標題改為“政變原因答客難”刊登在《清議報》第3號“論說”一欄，後又被收錄在單行本《戊戌政變記》中）。

如此一來，《東亞時論》雜誌不僅沒有止步於對西太后措施的批判，還公然表彰烈士譚嗣同，自然會被看做是對康梁派現在思想與行動的支持。

白岩龍平看到第2號後感想如何，目前沒有發現記載。但不難想像應該是又驚又怒。另外，我們也不知道對創刊號基本表示滿意的近衛，是如何看待對康、梁表示全面支持的編輯的。從東亞同文會創辦時對改革派看法的分歧來看，刊登康、梁的文章不會感到奇怪。或許他認為，在會刊這樣一個討論的平臺上刊登各種不同看法的文章反倒比較好。不過，他本人並不支持康、梁。所以，近衛在收到白岩12月25日的來信後，曾在“來狀”一項“白岩龍平”下面寫道：“保護康有為等不利本邦一事，得我意。”由此可知，近衛與白岩有着共同的意見。這意味着，負責雜誌編輯的相關人士，其對康、梁表示支持的態度壓過了會長的意志。近衛還在“田鍋安之助”一項下面寫道：“內附白岩信函，與致吾信函主旨相同。”這說明，除了會長以外，至少對常任幹事，白岩也表達了強烈的抗議。田鍋本心如何，尚不得知，但在近衛表示與白岩看法一致以後，應該是服從的。

不過，還是出現了繼梁啟超《辯誣》之後對其表示擁護的文章。這就是不久之後內藤湖南發表的《清國改革之風氣未盡》（《萬朝報》1899年2月9—10日）。內藤認為，被批評“過激施政”等事皆為清國志士多年追求改革的成果，反問如今西太后掌權後豈不是依然在講與皇帝維新相同主旨的改革。

對於白岩的要求，表示“得我意”的近衛覺得，自己作為會長，必須使自己的意見反映到雜誌編輯上。在這之後，也就是1899年新年過後，近衛的日記裏基本上就沒再出現財部熊二郎與志村作太郎的名字了。肯定不是沒見過面，而應該認為這是近衛沒有寫進日記裏比較妥當。

證據高於論述，《東亞時論》在第4號（1899年1月25日）刊出梁啟超的《聖德記》以後，不僅梁的文章，連中國人的文章都不再刊登了。《聖德記》是全面歌頌光緒皇帝聖明形象的文章，緊接《政變前記》之後，或許是因為要讓日本人清楚請求營教的皇帝是個什麼樣的人。

《東亞時論》刊登的《聖德記》中指責西太后的幾處，與光緒帝賜“坐”伊藤博文部分，均做了空白處理，“●”符號異常醒目。《清議報》上的《聖德記》沒有空白，第1章刊登在該刊第2號的“論說”一欄，剩下的登在了第9、10號的“支那近事”一欄。

《東亞時論》第5號刊登了內藤湖南的《支那改革助成之一手段（改革諸派的調和）》。這是讓清日兩國政府認識到保護亡命政客的必要性，呼籲汪康年（1860—1911）、康有為、孫文及其他改革派聯合的一篇文章，也是這份雜誌支持改革派文章中的“尾聲”。

以東亞同文會有識者為中心支持維新派亡命者的活動，在白岩為代表的在清國經營事業一夥人的反對下被迫中止。編輯方針的突然變化，若沒有近衛會長的介入絕無可能，所以說，近衛依照政界上層的意志選擇了與清政府協調的道路。康、梁二人在《東亞時論》上表示支持自己的文章祇刊登到第4號，歷時短短兩個月便結束了。但是，這一事實所象徵的日本知識分子努力支持鄰國維新的行動，卻在歷史上留下了鮮明的痕迹。

四 梁啟超周圍的政治狀況

毋庸諱言，梁啟超在日本的活動還受到了日清兩國政治外交關係的極大限制。

原本對西太后而言，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逃亡海外即為不可原諒之反逆行爲。所以在1898年12月5日向沿海督撫發出搜查逮捕令，駐日公使李盛鐸（1898年10月至1900年11月在任）也接到對康梁二人就地處決的密令。不久後的1899年7月，又派密使劉學詢等人前往日本，目的就是要處決梁啟超。^①

清政府曾要求日本政府將康、梁遣返回國，在明知不可能之後便要求放逐海外。12月7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代理）小田切萬壽之助告知張之洞（1837—1909），日本政府已承諾將迫使康梁二人離日。由此可以推測，山縣內閣（外相為青木周藏）的方針在12月上旬即已確定。

日本外務省最初計劃是讓康梁二人一起離日。擔當此任的是精通中文的書記官榎原陳政。外務省記錄的《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ノ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ヲ含ム)》第1冊顯示，1898年12月22日，榎原與梁啟超見面，以日本甚危險為由勸其赴美，旅費“三千日元”，若不夠“多少都補”，但被梁啟超“斷然拒絕”。據說，之後榎原再三訪問，梁一概謝絕。此後，在犬養毅的居中調解下達成協議，“將康一人外送”，給他“七千日元左右”作為費用（早稻田大學藏《大隈文書》B百五十一-5：1898.12.28付書簡）。

為此事畫上句號的是近衛篤磨。1900年1月19日，也就是《東亞時論》編輯問題的處理基本結束之時，近衛以“康有為的事”為名把梁啟超叫到自己家中。他安排柏原文太郎（此人可以說是梁的保護人）與翻譯羅普同行，可以看出近衛用心之周到。雙方交談內容如下：近衛稱，“康有為在日本不僅有礙今日兩國之交往，康的志向也難以達成，應該漫遊歐美為宜。余亦勸說康，也希望梁能夠從中勸說”。對此，梁啟超筆答如下：

康先生亦久有一游歐美之志，然所以遲遲者亦有故，其一以日本同為東方關係之國，利害相同，故深願使兩國社會上之交日親，以為往歐美之關係，不如貴國，故願滯貴國也。若歐美之行，於閱歷及增長學識，所得甚多，然所以有難者，其中瑣瑣之故，柏原君略能知之，此行期之所以不能速也，今承明公之相告，想必敝政府有責言，而貴政府有難處之故歟，乞見示。

這是以謝意進行辯解之辭。接着梁的話，柏原稱“榎原之勸說離譜”等語，是對梁的援護。對此，近衛補充道：“余並未如榎原等人般亂云脅迫之語，乃誠心誠意為康之將來而勸言，昨日與大隈伯就此曾面談，望相信伯與吾出發。”對此，梁啟超答曰：“盛意敬聞，命矣，謹當覆命於康先生，即約譯人，譯人既至，便當西遊，至敝邦之事，回復未有預期，康先生一游歐美，一年數月之後，仍欲歸於貴邦，專講兩邦社會聯合之義務，未知可否。”在大隈、近衛的壓力之下，犬養的妥協之策逼着梁啟超使此次談話有了結果。就這樣，康有為於3月22日離開日本前往加拿

^① 劉學詢等人以締結“清日同盟”為名訪日，利用孫文試圖處置康梁派的行動〔狹間直樹：“就劉學詢與孫文關係的一個解釋”，《學術研究》11（2004），蕭平譯〕。

大的溫哥華。

這個時候，康有為對包括近衛在內的日本人似乎沒有任何的不快。離開日本的前一天，康有為與中西正樹、柏原文太郎一道，為在“明日出發之際，對過去之盡力表示感謝，並道別”前去拜訪了近衛。同時，還在明夷閣設別宴招待犬養毅、松崎藏之助、柏原文太郎、陸實、桂五十郎等人。在宴會上以及到達加拿大後贈給“東國諸公”的詩，均充滿了真切的離別之情。不過，當他半年後再來日本時，由於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入境許可，這纔意識到“離日”即是“放逐”。

另外，對這一時期不能遺漏的是，近衛在講中心問題——康有為問題之前對梁啟超進行的“忠告”。近衛的談話非常直接：“梁以今日之處境，為橫濱《清議報》執筆頗不妥當，應與該社斷絕關係。”這是命令。意思是，讓你在日本居住，但不能進行活動。如此，祇能解釋為，這是對清政府的顧慮。針對這一命令，梁啟超答曰：

承見愛護當遵教，惟《清議報》之初起，僕原無久任其事意，今已由報社諸人別聘他人來任其事，此後僕即擬任撰述，惟此報既開，似亦不可中止，聽其仍開，而別撰他人如何？時值《清議報》剛出版第3號。近衛讀過多少該報的文章暫且不論，但他肯定是在瞭解到該報以攻擊西太后政府為目的之後逼其斷絕關係的。因此，作為對近衛的當面回應，梁啟超答以並無此意應該說是十分合乎禮儀的。曾經認為對身為亡命客的自己是保護和支持態度的日本，如今卻禁止自己進行活動，說明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

當然，梁啟超並沒有打算離開這一重要的宣傳媒體。在與近衛會面後編輯的《清議報》第5號（2月1日）上，他發表了沒有署名的文章《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此文前一年3月曾發表在湖南的《湘報》上。寫的是為擺脫“三等野蠻之國”成為文明國家，須掌握“法律之學”，論述的形式是口號式，所以沒有什麼實質的內容。當他注意到自己的存在與活動受到“大日本帝國”這一國家壁壘的壓迫以後，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法”上面，又採用了以前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在第6號上以筆名“哀時客”發表了《愛國論》。這一筆名，淋漓盡致地反映了作為亡命者的悲哀。從此次第一次使用，到一年後赴美前《清議報》出版第33號，幾乎一直都在使用“哀時客”。因其之前普遍使用的筆名是“任公”，梁啟超之意圖顯而易見。

《愛國論》的內容論述的是西方人所說的“中國人沒有愛國之性質”這一問題。“海外之民”皆踴躍“變法”，為“政變”扼腕歎息，所以中國人並非沒有愛國之本質，問題在於不知“國”為何物。作為論述的依據，他說，出外國方知國民所受之“權利”及所得之“保護”為何，將其與清國人在外國所得的“權利”與“保護”相較之下，令人不禁痛心疾首。

文章中雖然沒有明說，但毋庸置疑，這是梁啟超在近期經歷了近衛（在白岩的要求下）把自己等人的文章從《東亞時論》上排除掉後之所為。因為，編輯等人不可能不告知梁啟超，他們的編輯方針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近衛甚至還置喙《清議報》的編輯問題。殘酷的現實使梁啟超認識到，白岩等人有“國家”保護，而自己等人卻沒有保護自己的“國家”。

另外，文章中還提到，愛國心的培養需要教育，“群學、國家學、行政學、資生學、財政學、哲學”等“致用之學”就是為達到這一目的的學科。教授之後，一旦今後“中國維新之運”到來時，則必須為“國家”發揮作用。國民當以國為一己之國，國事為己之事，國權為自身之權，國恥為一己之恥，國榮為一己之榮。“民與國是一為二，二為一的關係。”

結語

在日本四個月的流亡生活，使梁啟超對“國家”之於自己如何相關有了具體的認識。起初，日本全面支持梁的生活，使其開展救皇運動；但不久之後，同樣的日本，卻控制他們在輿論機構公開發表意見，並接受北京政府的意見把他們給放逐了。轉折的基軸是保護日本國民在清國的活動問題，以及避免在外交關係中的不利因素。這兩點，都是因為他這個直接的當事人而發生的。

進言之，過去他祇用“腦袋”理解的問題，如今卻是切身之感。正如日本之所為，近代國家須保護現實中的“民”。清朝之將來，也須站在把國家改造成這樣的基礎之上。作為這一經歷的反芻，梁啟超認識到，民需要保護民之國家；如果沒有，則須創造，為此必須學習關於國家的知識和理論。

《清議報》第6號“論說”欄目刊登的哀時客的《愛國論》，是梁啟超針對近衛命令的暫且回應。在下一期刊登的哀時客《愛國論（二）》中，稱西方國家為“君民共有之國”，而中國“國為一家人之物，他人皆為奴隸”。第9號“論說”欄目中《尊皇論——論保全中國非賴皇上不可》^①，在以往保全中國需要依靠聖明皇上之論調的基礎上，強調了愛國心涵養的必要性。作為當下之政策，在哀時客的《商會議》（第10號“論說”欄）中提出，模仿英國東印度公司將印度納入統治之下，代用中國固有之“地方自治之制”的商會。類似這種摸索之後，梁啟超在第11號（1899年4月11日）終於修改了《清議報》的編輯方針。

梁啟超新的編輯方針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修正了過去“堅持清議、開發民智”的抽象方針，展開實用性的“政治學、經濟學[理財學]”學說，並將之引入中國。為此，還新設了“政治學譚”一欄。該欄目中刊登的是德國伯倫知理（J. K. Bluntschli, 1808—1881）寫的《國家論》，借用的是吾妻兵治（1853—1917）的譯文《國家學》。伯倫知理的國家學說是以國家有機體說為基礎的，故立憲國家的君主為有機體之“頭部”，作為領頭人包括在“國民”之中。對擁護聖明的光緒帝進行變革的梁啟超而言，這一學說甚合其意，自不待言。

因遭到近衛篤磨的無情傷害而開啓“國家”認識的梁啟超，在“民族帝國主義”繁榮的當時，開始意識到必須將思考的基礎放在國家上面。就這樣，《清議報》時期以後，梁啟超掌握了“國家主義”，並將之作為自己的根本思想；直到約二十年後，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方纔宣佈放棄。

〔編者註：該文原係作者向澳門大學2015年11月14—15日舉辦的“晚清的重新審視”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在聽取與會者意見之後又做了一些修改，由高瑩瑩翻譯。〕

^①《尊皇論》在《戊戌政變記》（九卷本）中被改成第五篇《政變後論》第1章，以“論中國之將來”為題收錄其中。不過，不包括《飲冰室合集》專集，因為其收錄的《戊戌政變記》刪掉了第五篇，成為八卷本。另外《〈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也未收錄該文。